

顏李學派的程廷祚

胡適

廿七年二月十九日閱

所作論程說之敘文論程說余有單行舊抄本

摺初記

國立北京大學國學季刊五卷三號

抽印本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7385B

顏李學派的程廷祚

胡適



I.

康熙三十年辛未(1691)三月二日,程廷祚生於江寧上元縣。程晉芳作綿莊先生墓誌,說他“初名默,後更名廷祚,字啓生,別號綿莊”。又說他“以家近青溪,生平出處與劉巖兄弟相類,晚年乃自號青溪居士。”他早年曾用程石開的名字。

他家原來在徽州的槐塘;明朝天啓年間,他的曾祖程虞卿才從徽州遷到南京。程虞卿大概是個商人,往來於杭州南京之間,所以他的兒子任之是“錢塘秀才”,大概是用“商籍”考試的。

程廷祚的祖父任之和他的父親京萼(字章華,號祓齋),都是很有風骨的人物。程任之是黃道周的好朋友。崇禎甲申(1644)之變,任之把家眷送回徽州;後來南京的局面倒了,黃道周到了福建,任之曾去看他。但他不久仍回徽州。黃道周兵敗被捉,任之從徽州趕到南京,道周已被殺了。他還到鳳臺門去哭祭他。(青溪文集續編三,書石齋黃公遺詩後。)

任之是明朝的一個遺老,所以他的兒子京萼也頗有遺民

的風概。他寫的字很有名，靠賣字餬口。

八大山人，洪都隱君子也，或云，明之諸王孫，不求人知。時遣興潑墨爲畫，任人携取，人亦不知貴。山人老矣，常憂凍餒。府君（京蓼）客江右，訪之，一見如舊相識，因爲之謀。明日，投箋索畫於山人，且貽以金，令懸壁間，箋云：“……公畫超羣軼倫，真不朽之物也。”……江右之人見而大譁，由是爭以重貲購其畫。……山人頓爲饒裕，甚德府君。山人名滿海內，自得交府君始。（文集十二，先考祚齋府君行狀。）

父是黃石齋的朋友，兒子是八大山人的朋友，這個家庭可說是一個明朝遺老的家庭。行狀中又說起吳雲（舫翁，明朝遺老，明亡後做了道士。）曾於康熙戊寅（1698）從江西來訪京蓼；時值“人日”，京蓼置酒飲宴，和他談治論學，到天明才去。吳雲畫“商山圖”贈他，此題的意義明說京蓼也是一個遺老。其時程廷祚已有八歲，吳雲也很賞識他，爲他賦“小友行”。（行狀）

廷祚之母姓徐。程晉芳作綿莊先生墓誌，說：

父京蓼，字韋華，能詩工書，遯跡不仕。年近六十，始娶口氏安人，舉二子，先生其冢嗣也。（勉行堂文集六。）

晉芳所記不甚正確。廷祚自記云：

初府君少聘於田氏，明祠部郎大同田公季登女也。早卒，未果成婚。而甚爲婦翁所器，不忍忘知己，爲不娶者二十六年。後迫于王母之命，始娶徐孺人。

京蓼死時（1715），年七十一，廷祚已二十五歲了。娶徐夫人時，京蓼不過四十多歲。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1692),程廷祚出世的次年,他的父親京蓼遊武昌,認識了陶竄,陶竄字甄夫,也是一個明末志士的兒子。陶竄的父親陶泓,字秋水,官主事,改同知,曾從軍,兵敗後入滇,憂憤而死,遺命兒子們不得做官。陶竄一家住在雲南的教化長官司,他二十六歲時(1682)才出滇,尋到他的巴陵故鄉,把一個兄弟留在那邊,他自己回到雲南,把陶泓的棺材和一家人都接回巴陵。這個人的行爲頗有點像儒林外史裡的郭孝子。他後來不但把兩個女兒嫁給程廷祚和他的兄弟嗣章,還介紹他讀顏李的書。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1700),程廷祚十歲,他的兄弟嗣章八歲。陶竄從浙江來遊南京,訪京蓼,談了一天,別去。他見了廷祚兄弟,很賞識他們,就托人寫信來,要把兩個女兒許給他們兄弟。

次年程廷祚的母親徐夫人死了。京蓼答陶竄書,決定婚約。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1709),程廷祚十九歲。在這一年的北方顏李學的領袖李璿(恕谷,時年五十一歲)受了陝西富平縣知縣楊勤的聘請,到富平作幕賓。這時候,陶竄在商州知州沈廷楨的幕裏。是年李璿和沈廷楨在省城會見。恕谷年譜裏記沈廷楨來拜,自稱後學,說“天下惟先生一人。”

次年(1710)李璿再往富平,閏七月遊商州,沈廷楨迎入州署,這是李璿第一次認識陶竄。年譜中記:

甄夫出所著熊襄愍(廷弼)傳,言殺襄愍者,道學鄒元標也。

先生(李璿)因歎道學不能辦事,且惡人辦事。

沈廷楨留先生居商州講學，辭之。執贄令其子永言，姪素存（都是陶竄的學生）從學，辭不獲已，受之。

先生贈甄夫玉帶，甄夫報以核桃硯。（恕谷年譜卷四。）

程廷祚作外舅楚江陶公行狀，（文集續編八。）記

羅田令沈君廷楨擢商州牧，公（陶竄）時教其子，與同去，凡三載，因徧遊咸陽以南，覽關西形勝，登太華絕顛，極目沙漠之表。……已而病目，幾失明；愈後歸武昌。

但此狀中不提他在陝西見李璫的事，全篇也沒有一句話談起顏李學派和陶竄的影響。大概他作行狀時，已不很願意宣傳他和顏李學派的關係了。

行狀中說陶竄

早棄制舉業，獨攻經史之學，能晰大義。善爲詩文，旁及書畫摹印，無不精妙。自號曰楚江陶者，嘗自序曰：“陶者喜讀書，每恨不生定哀間，與游夏諸賢相上下。雅不好仙佛，亦不喜濂洛，謂聖賢者貴于致用，安事虛談性命，儻神章句耶？”

在這寥寥幾句自序裏，我們還可以看見一個顏李學者的氣概。

康熙五十年辛卯（1711），陶竄帶了家眷，從武昌遷居南京。

次年（1712），陶家兩個女兒嫁給程廷祚（二十二歲）程嗣章（二十歲）。嗣章字南耕，用力于史學，也頗有名。

結婚之後，程廷祚從他的岳丈那邊得着顏元的四存編和李璫的大學辨業。他那時不過二十二三歲，還在一個容易受感化的時期，他讀了這些書，又受了陶竄的直接影響，在兩三年之間，他的思想起了絕大的變化。他變成了顏李學的一個青

年信徒。

康熙五十三年甲午(1714),他二十四歲,在那年的冬天他發憤要編一部“閑道錄”,“閑”是防護,這部書的目的是要防護正道。他擬定了編書的條例,寫了一封信給李塨。這封信不曾收在青溪文集裡,現在保存在李塨的恕谷後集裡:

新安後學程石開頓首再拜,謹奉書

恕谷先生門下:

開少好辭賦,亦爲制舉文,其於學術之是非真僞,未有以辨也。弱冠後從外舅陶甄夫所得見顏習齋先生四存編及先生大學辨業,始知當世尙有力實學而繼周孔之緒於燕趙間者。蓋聖學之失傳久矣,數百年來,學者不入於朱,則入於陸,互起而譁。自習齋先生出,舉唐虞三代學教成規以正流失,廓清紹復之烈,未見有如之者也。先生嗣其後,自當若孟子之遵孔子。不然,則荒塞於戰國之橫議,而孔子之道未必尊師,至今爲烈也。夫物盛則衰。以先生師弟得二千載已喪之真傳,乘數百年將更之氣運,宜一呼而靡然從風。然而應者尙寡。非三代周孔之學必不可行於後世也。靜坐讀講,其習進可以干祿,而退易以自足。二先生所爲教,則孝弟忠信,禮樂兵農,躬行力學,不得漫然虛大者也。又安肯違其所甚樂,而從其所不便耶?雖然,勢極必返。願先生省可已之文辭,絕無益之交往,保愛精神,以道自尊,而專肆力於周官“三物”,旁求同志,益廣其傳,令天下不病於道之難行,而咸信夫古之易復。則先生之無負習齋,而大有

功於當時後世者也。開也愚弱，未能即時北上擔簦執贄，擬先撰閑道錄以矢願學之心。謹條錄請正，臨書不勝瞻依馳溯之極。

這封信是次年春天(1715)托人帶去的。那時李璿住在保定蠡縣，交通不便，這封信在路上擔擱了差不多三個整年，直到丁酉年(1717)十一月初八日，才到得李璿的手裏。

那時李璿已是五十九歲的老人了。他的老師顏元已死了(1704)十四年了。自從顏元死後，他時時留心尋訪可以付託顏氏學統的人。康熙丙戌(1706)，他的好朋友王源從廣東回來，向他提起魏禧的話：

考古以証今，闕事以察理。求友以自大其身，造士以使身之不死。

李璿很佩服這幾句話。他們從此更留意延攬人才來“自大”其學派。他們起先看中了方苞與戴名世，尤其是方苞。戊子年(1708)，李璿寫了一封最懇切的長信給方苞，勸他接受顏氏學說，書中說：

今璿年五十矣，素原愚弱，更向衰老，而夾扶寡侶，傳受渺人，……日爲壹鬱。以門下之德望，若得同心倡明正學，則登高而呼，所聽者遠，南中後進殊尤，必有聞風而興起者。較之窮崖空谷之鳴流，雖厲莫聞，何雷霄壤？

最後說的更沈痛了：

今聖道之悠謬二千年矣，顏先生忽出而獨尋墜緒以開吾徒，豈一人一心之力所能致此，殆亦天地神聖之所啓也。門下雅欲爲不朽人，必不隨場觀笑。富貴既如浮

雲，文辭亦屬春華。其所以屹屹自立者，必有在矣。繼往開來，幸力自決。(恕谷後集四)

但方苞（戊子年四十一歲）沒有這種“繼往開來”的勇氣；他的最高理想只是“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在韓歐之間。”不久（1711）他又被他的同鄉戴名世的南山集案子牽累下獄了，在獄裏一年多（1711—1713），被清聖祖特別赦出。從此以後，方苞成了皇帝最賞識的一個文人，他在那提倡程朱理學的康熙帝和李光地的庇護之下，更不敢做打倒程朱的顏學領袖了。所以他不但沒有接受李塈的懇切勸告，後來竟成了顏學的叛徒。康熙六十年（1721），李塈的長子習仁死了，方苞寫信給李塈，說這是攻擊朱子的報應！他說：

記曰：“人者，天地之心。”孔孟以後，心與天地相似而足稱斯言者，舍程朱而誰歟？若毀其道，是謂戕天地之心，其爲天之所不祐，決矣。故自陽明以來，凡極詆朱子者，多絕世不祀。僕所見聞，具可指數。若習齋西河（毛奇齡），又吾兄所目擊也。……倘鑒愚誠，取平生所述訾訾朱子之語，一切薙芟，而直抒己見，以共明孔子之道，則僕之言雖不當，而在吾兄爲德盛而禮恭，所補豈淺小哉？（方望溪文集六）

後來李塈死了（1733），方苞不待請求，自己作李剛主墓誌，說王源被他駁倒了，“終其身口未嘗非程朱；”又說他從刑部獄裏出來時（1713），曾力勸李塈，李塈也聽了他的話，

立起自責，取不滿程朱語載經說中已鏤版者，削之過半。（望溪集十）

他這樣誣讒王源和李璿，大概只是要洗刷他早年和顏李學者往來的痕迹。他已是驚弓之鳥了，沒有“乞乞自立”的勇氣了。

李璿那時最佩服的是王源，但王源已死在客中了（1710）。在程廷祚寫信的那一年（1714），李璿新得了一位南方同志，他是武進的惲鶴生，字臯聞，學問見識都很好，又是誠心的信仰顏李之學，所以李璿很高興。但惲鶴生那時已是五十歲的人了，究竟不是年富力強的後繼者。後輩之中，只有一個馮辰（字樞天，清苑人），但也不是有“繼往開來”的魄力的人。

在那個最盼望青年後起有人的時期，忽然一個寒夜裏來了一個江南青年信徒的熱烈同情的書信！李璿收到程廷祚來信時的歡喜，全流露在他的復程啓生書裡：

丁酉十一月朔後八日，安平門人趙漸遠持一函至，燈下展讀，則發自金陵，甲午冬書，乙未春付郵，至今四載始達。鑒照高遠，辭滾滾如江河。讀已而喜，再三讀不自休。嚮嘗疑天意不可知，今乃知天之不爽斯文必然也！不然，足下年才逾弱冠，而卓見聖道如此，豈造物無意篤生者耶！

他很老實的傾吐他“求友”的心願：

璿自二十一歲從遊顏習齋先生，……犬馬之齒今歲亦遂忽忽五十有九矣。每午夜旁皇惆悵，以遠近問學者雖有其人，大率一長一解。求其明於心，行於身，宣暢於言語，發揮於事業，可全以付者，寥寥。

甲午冬，武進惲臯聞至，博淹敦廉恥，一聞習齋學，遂共學。篤行著書，裨予不逮，殆其人也。然退而思之，又悒悒不

樂。臬聞少余不及十歲，其與陶甄夫之與予交，年之先後髣髴也。及予老耄，而諸君亦就衰矣。非後進英奇使聖道相衍遞嬗以至無窮者。今乃忽得之！足下年少才高，議論輝光肆映如偉炬燭天，此天特生之以使周孔之傳不至墮地者也！則習齋雖亡而不亡，謏陋雖衰而未衰也。慶幸私情，冀望無涯。

我們現在讀李璿給方苞和程廷祚的兩封信，還不能不感覺到他的苦心，他的熱誠，他的悲哀，他的歡喜。對於那個不曾見面的江南少年程啓生，他從此抱着絕大的希望。

恕谷年譜在次年(1718;恕谷六十歲)記云：

看陶甄夫秦闢稿序，內有云：“顏李之學，數十年來，海內之士靡然從風。”豈南方信此道者已衆乎？

這當然是引恕谷“日譜”的原文。陶竄這一句話正打在李璿的心坎上。他在壯年時曾到過江南，他現在想再去看看，究竟陶竄的話是不是太樂觀了。在這一年(1718)，他出去做了八十天的通州學正，次年回到家裏，決定要往南方去。年譜記云：

思身已衰矣，行道無望矣。廣布聖道，傳之其人，是余責也。南方學者多有興起，當往觀之。

他於八月二十日出門，先到安平縣，見着趙偉業；次到棗強縣，見着王宗洙；次到故城縣，見着惲鶴生，互換他們的日記，各有評語。從故城到鄭家口，見着劉敬庵姬鶴亭。故城鄭家口都在直隸山東的邊界上，從此入山東省，到武城縣，見着劉天植張熙甫。九月中，他回到棗強，仍由安平回家。他有詩云：

一鞭遊歷戒清途，爲喜斯文近不孤。

到處入門攻禮樂，幾人搔首問黃虞？

清河滄水天光遠，蠶廟漿臺草色枯。

墜緒茫茫儼有待，可能萬里走鬪？

隔了一年，李璩六十二歲（1720），他決定搬家到南方去住。他進京去和方苞商量。那時方苞雖已赦免，雖已得康熙帝的信任，但已被改隸漢軍旗籍（直到雍正元年，1723，才赦歸原籍），不能回南方去了，所以方苞把他的南方田宅和李璩的北方田宅交換。方苞寫了家信，付李璩帶回南去看田宅。十月中，李璩南行，十一月十七日到江甯，住方苞宅內。

他在南京見着程廷祚和別的朋友。這時候程廷祚已三十歲了。程廷祚自己也說：

某弱冠得讀二家之書，壯歲晤剛主先生於白門，往復議論。（青溪文集續編，與宣城袁蕙雜書。）

這時候，陶嶽已死了一年（1719）；程京萼已死了六年（1715）了。李璩很屬望於程廷祚，這一次南來的一個目的是要抓住這個年少才高的新信徒。他本已決定久住南方，所以他這一次在南京住的日子很短：十一月十七日到南京，十二月初六到高淳看田，又到寧國，在寧國知府黃瑤圃的衙門裏過年，次年（辛丑，1721）正月初九才回到南京方宅，正月十七日就北上了。看年譜所記，李璩在南京作贈張顓門序（序見恕谷後集二），有程啓生的長跋，此跋也不會收入青溪文集，其中有幾句話是值得注意的：

恕谷先生來金陵，請業問道者無虛日，而顓門與焉。夫先生之學追聖軼賢，其論道之始卒，非好學深思者，或癩於舊說而疑之。顓門獨以年少往來寓室，從遊靡倦，必

其好之篤而信之專也。……先生以成就後學爲己任，……讀此序許以大節，期以進道，惓惓然信乎大賢之用心也。因樂聞而系語於其後。

這篇跋很明白的承認李燾之學“追聖軼賢”，很明白的尊他爲“大賢”，這是他信仰顏李學的最高點。跋中又說張籲門“以年少往來寓室，從遊靡倦”，我們可以想見程廷祚當然也是那樣“往來寓室”的一個。

不幸李燾南遷的計畫竟不能實現。他從江南回來，曾有這樣的觀察：“一路見東省北省人之橫詐，不如江南人之和平，恐禍之未艾也。”他南遷的意思是很堅決的。但二月初十日到家，閏六月他的老母親就病了。七月裏，他派他的長子習仁夫婦同方苞的妾南下。七月二十六，李燾的老母死了。習仁在船上得病，死在泊頭。李燾大哭道：“天意不使南也！已矣！”從此以後，他拋棄他的南遷計畫了。

大概當時北京的空氣是尊信程朱的，北方一帶逼近京城，空氣很不自由。李燾壯年曾到南方，看見了毛奇齡閻若璩費密等人在南方提倡非正統的思想，都可以自由活動，所以他決心想把顏李學派的大本營搬到南方去。（李燾自作墓志，說“十四王在西睡，使人兩次千金延聘，避如江東。”大概避禍也是一個原因。）不幸他在一年之中兩遭大喪，他最屬望的長子之死更使他傷心。一年之後，方苞又被赦免入旗的處分，恢復了原籍，互換田宅的原議大概也因此取消了。從此以後，顏李學的大本營仍繼續在蠡縣博野之間，因爲交通上的不方便，李燾的“廣布聖道，傳之其人”的計畫是不容易實行的。顏李學始終不得大發展，這

個地域上的因子是很關重要的。

李塏決定不南遷了。此後程廷祚的消息，在恕谷年譜裏只有這樣一條：

丁未(1727)，六十九歲。三月，南方諸友周崑來，李師柏，程啓生，各有書來。

又有這樣一條稍有關係的：

戊申(1728)，七十歲。張顛門書至，言願表章顏先生之學，望聖道之明，行其素志也。今帶銀二兩，倩人鈔先生諸著，將刊行。

戴望作顏氏學記，在程廷祚的小傳裏說：

康熙庚子歲，恕谷南遊金陵，先生屢過問學，讀顏氏存學編，題其後云：

“古之害道出於儒之外，今之害道出於儒之中。習齋先生起於燕趙，當四海倡和翕然同風之日，乃能折衷至當，而有以斥其非。蓋五百年間，一人而已！故嘗謂爲先生者其勢難於孟子，而其功倍於孟子。讀其書則其語言行事之實可得而知也。”

戴望不會說明他根據的是何書；這篇跋是可信的，但戴望說此跋寫在李塏南遊之後，似有可疑。程廷祚第一次上書給李塏，已明說他早已讀過習齋的四存編了。不應到此時還跋存學編。跋中有“讀其書則其語言行事之實可得而知也”一句，使我們疑心此跋是讀習齋年譜和習齋記餘等書的書後。大概李塏南下時帶了顏元的遺著多種，程廷祚讀後題此跋。“五

百年間，一人而已”，這句話可見程廷祚在那時對顏李學的熱誠信仰。

但程廷祚對於顏李學的熱誠，不久就受了外面環境的影響，起了一種大變化。他好像是變的膽小了，有點怕懼了，不敢公然攻擊宋儒了，更不敢攻擊程朱了。這個態度的轉變起於程廷祚的到北京。雍正甲辰（1724），他三十四歲，他第一次遊北京，住了幾個月（青溪文集續編三，儲恕齋傳）。雍正乙巳（1726），他三十六歲，又到北京應順天鄉試（文集十二，余公墓表），到次年丁未（1727）才歸去。這兩次在北京，他很可以到保定蠡縣去看看他那位最崇拜的李塹，還可以到博野去拜祭那位“五百年間一人而已”的顏元的墳墓。然而他兩次都悄悄的走了，都不曾繞道去蠡縣。直到他第二次回南的那一年（丁未）三月間，他才有信給李塹（恕谷年譜，引見上文）。這種冷淡的態度不是很可以注意的嗎？恐怕蠡縣的同志們早已感覺到這種變冷淡的態度了。所以在李塹的最後十年中，他好像不提從前熱烈期許的程啓生了。年譜裏時時提起的是惲鶴生，蠡縣新建的“道傳祠”裏，也只有惲鶴生的生像，算是顏學的第三代傳人。青年信徒之中，李塹最期望的是那位新來的二十四歲（1723）的劉調贊（字用可，威縣人）。他在母喪期中，破戒作詩答劉調贊：

……天地依然成上下，孔周豈遂竟浮沉！

雄才欲負千秋業，高足應登萬仞岑。

每度長宵悲墜緒，從今收淚付球琳！

他把當年對程廷祚的熱烈期望轉移到這個二十四歲新信徒身上去了。

程廷祚的態度的轉變起於他的北京之遊,這是他自己後來明白承認的。有一位宣城袁蕙纓,大概也是一個顏李學信徒,曾寫一封信去責備程廷祚,質問他爲什麼不宣傳顏李的教旨。程廷祚有一封信答覆他,這封信徵幸保存在他的青溪文集續編裏,是最有趣味的思想史料。他說:

前接手示,意氣懃懃懇懇,真有道有識者之言也。去古逾遠,居今之世,議今之學,則或以生今反古爲戒。然孔子論禮樂則從先進,語爲邦則探夏殷,孰謂聖人於問學之際而有所禁忌乎?第可爲知者道耳。

承反復于某不以顏李之書示人。其故有可得而言者。蓋學者束縛於功令,而習見之蔽錮于其中也,非一日矣。某弱冠得讀二家之書,壯歲晤剛主先生於白門,往復議論。未幾遊京師,而當代名儒卽有疑其以“共詆程朱”相唱和者。夫孔孟既沒,程朱奮乎百世之下,以斯道爲己任,此誠聖賢之徒,而非可以妄加以譏評者也。第其學出于遺經,參以己意,與杏壇親炙者有間,故於聖道不無離合。數百年以來,卒未有窺其底蘊者。……國朝顏李崛起,乃能舉其是非得失之大者,以與六經証其異同,而冀幸學者之一悟。可不謂先聖之功臣而宋賢之益友歟?……

然而聞“共詆程朱”之說,不可不爲大懼也。某之懼,非敢不自立而甘於狗俗也。易稱“時”義之大,故君子時然後言。論語又曰,“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當舉世未能信從之日,而強聒不舍,必有加以非聖之謗而害

其道者，不可之大者也。當舉世未能信從之日，忽有聞而愛慕之者，而亦不與之言，是咎在失人，而坐視其道之終晦，亦不可也。

凡某之不敢輕于有言，皆爲道謀，而非計一身之利害也。

茲幸遇足下研精聖學，不以成見自畫，獨有樂乎恕谷之書，且哀輯之，以廣其傳，真斯道之幸，前哲之幸，而區區之誠寤寐弗諼者矣。（續編七）

這封信的重要性有幾點：第一，它證明程廷祚確有“不以顏李之書示人”的事實。第二，他自己承認他的態度轉變是在見李塈之後不久他遊北京之時。第三，他承認，他所怕的是“共詆程朱”的罪名，因爲這是違犯“功令”的大罪名，可以被人“加以非聖之謗而害其道”。他因爲愛護顏李之學，所以“不敢輕于有言”，並非計一身之利害。第四，他自己宣言他還是尊信顏李之學的。遇到適當的時機和適當的人才，他還是要傳播顏李之學，不肯“坐視其道之終晦”。

我們審查他的著作，可以相信這四點都是真實的。關於他對程朱的態度，和他的繼續保持顏李學者的立場，我們在下篇另有詳細的說明和討論。我們在這傳記的部分，只要指出他在雍正初年兩次到北京之後，他的態度確是變了，變的更小心了。從此以後，他不願擔負“共詆程朱”的惡名，所以在形迹上漸漸和顏李學派中人疎遠了，也不敢公然攻擊程朱了，甚至於“不以顏李之書示人”了。

他說他“遊京師而當代名儒卽有疑其以‘共詆程朱’相唱和

者。”這位“當代名儒”是誰呢？無疑的，是方苞。方苞和程廷祚同是安徽人，又同是住家在上元縣的，所以程廷祚到了北京當然去拜訪這位“當代名儒”。方苞那時正寫了他的與李剛主書，發表他的怪論：“凡極詆朱子者，多絕世不祀。”程廷祚也是沒有兒子的（他結婚已十多年了，尚無子女；後來納妾袁氏，也是二十年不孕；他竟終身無子），也許不免受了這種怪論的影響。但最大的原因恐怕還是雍正時代那種猜忌慘酷不容忍的空氣，容易使這位新進學者望而生畏。程朱的道學變成了專制帝王的護符，就更可怕了。程廷祚說他的小心是“皆爲道謀”，也許是真誠的解釋。（我們不要忘了顏李一派人是屢次被政治大案牽累的。李塨自記他最後的南下是有意逃避十四王子的聘請的；他的楊仁澍傳記的張萬載一案也牽涉到李塨和他的門人王孫喬。）

我們可以說，程廷祚的態度變和緩了。他要用和緩的，積極的方法來重新建立顏李學。不過在表面上他已走上了經學家的路子，專力治經學，也不廢詩古文的努力。這兩方面都是顏元反對的，但李塨已開其端，程廷祚走的更遠了。

程廷祚在父親死後（1715），喪期過後，就和他的兄弟嗣章同中了秀才。他下了六次鄉試，都不中舉人（文集九，答陶元玉書）。雍正末年（1735）開博學鴻詞科，安徽巡撫王鉉舉他應試。乾隆元年（1736）他到北京，這時候他已是四十五歲了。考試失敗後，他回到南京，從此不應鄉試，專心做經學的工作，同時整理他自己的思想，想組成一家之言。他的兄弟嗣章這時候在外邊作大官的幕賓，每年收入很好，所以能供給他的費用，使他可以專心著書。

他這以後三十多年的生活,可用年表方式記出:—

乾隆元年(1736),他到北京應試。他那時正開始著作他的“易通”,

寓居郊南之東嶽廟,其地人跡罕至。偶思離卦,覺舊解不安于心,因畫其卦而懸之壁間,出入思維。夜分,忽夢有人服如古王者,授以玩索之法。驚寤,挑燈錄之。翼日覆視,則無卦不當用其法。此紀元之歲八月初旬事也。(文集十一,與許方亨書。)

這一年他北上南下時,兩次過淮安,認識了程晉芳(魚門),後來他們成了好朋友,常常有書信往來,見於他們的集子裡。

乾隆七年(1742),方苞(那時七十歲)告老出京,回到南京故宅。他在南京住到他死(1749),凡八年。在這八年中,程廷祚和他往來很密。方苞做三禮義疏館副總裁時(1736),曾擬有纂修條例六條,作為羣經舊注纂集的總例:—

一曰正義,乃直詁經義,確然無疑者。

二曰辨正,乃後儒駁正舊說,至當不易者。

三曰通論,或以本節本句參證他篇,比類以測義;或引他經與此經互相發明。

四曰餘論,雖非正解,而依附經義,於事物之理有所發明。

五曰存疑,各持一說,義皆可通,不宜偏廢。

六曰存異,如易之取象,詩之比興,後儒務為新奇而可欺惑愚衆者,存而駁之。

這個條例大致是很有道理的,所以方苞頗自喜,他到南京時,雖然已是七十五歲的人了,他還有做“五經集解”的雄心。他自

已治儀禮，又請程廷祚用他的“六條”去編纂“周易集說”。這部書費了他十年的功夫，到方苞死後才編成，改稱“大易擇言。”

乾隆十六年(1751，他六十一歲)，江蘇巡撫保舉他應“經明行修”的召試，他到北京，又不中選。

乾隆十七年(1752)，他重訂他的易通，又作象爻求是說。

次年(1753)，他的晚書訂疑寫成。又編定他的青溪詩說。

乾隆十九年(1754)，他六十四歲，大病了一次，幾乎死了。

次年(1755)，他開始做他的論語說。這書最可以表現他的思想。他自己說，此書改訂於丁丑(1757)，又改訂於戊寅(1758)，凡四次改稿，始成定本。

他作晚書訂疑時，還不曾見着閻若璩的尚書古文疏證。乾隆二十一年(1756)，程晉芳替他尋得疏證，他讀了覺得不能完全同意，就寫了一篇尚書古文疏證辨(文集四收有此文)。

他死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三月二十二日，年七十七歲。

程晉芳說：

後十年，弟南耕老且聾，不能遠游，食指益繁，用是竭蹶。

先生處之泊如也。其狀貌溫粹，志清而行醇，動止必蹈規矩。與人居不爲崖岸，而自不可犯。(墓誌)

這是他的朋友對他的做人的印象。關於他做學問的方法，他自己曾對袁枚說過這樣兩句格言：“理見一層，更有一層。心細一分，還有一分。”這已是乾隆時代樸學家的治學精神了。

儒林外史的作者吳敬梓是他的朋友，他的集中有與吳敏軒書，又有金孺人墓誌，金孺人就是吳敬梓的姊姊。儒林外史裏用氣力描寫的莊紹光就是程廷祚。那是一個朋友的寫生，

雖然不是嚴格的傳記，究竟可以使我們知道他的朋友對他作如何看法。

儒林外史裏寫莊紹光的朋友盧信侯因為收藏禁書，被官軍圍捕。盧信侯就是青溪文集裏常提起的劉學稼。劉學稼名著，(後來改名湘堃)字允恭，湖廣江夏人，是一個算學家，曾在梅文鼎門下學算學天文。他是一個顏李學者。李璿最後南下的那一年(1720)，曾往寧國看田宅，年譜記云：

劉允恭持門生帖來視。允恭，舊日門生，此時從梅定九學數也。言定九欲來拜，八十八歲不能行，請先生往一晤。……明日乃同允恭往會定九。定九稱格物之解極是。將別，定九淒然留曰：“吾以先生為轉氣運之人，故使子弟羣瞻，且有許事相商。恐老不能再見矣。”

劉著學算學的成績是一部五星法象編，程廷祚曾替他作序(文集六；又續編八，寄陶嵇山書)。他又喜歡研究風水，曾為程廷祚到各地去看風水，替他的祖宗選擇墓地。他留心山川形勢，所以藏有一部顧祖禹的方輿紀要鈔本；並且親自到無錫顧家去借出原本來校勘，“時盛暑，蚊蚋蔽體，兩目盡腫赤，手不停筆。自比于王勝之之于司馬通鑑。”雍正十一年(1733)，劉著帶了這部方輿紀要到南京，住在程廷祚家裏。這部書本來不算是犯禁的書，却被一個顧焜在總督范時繹處告密，說劉著“交匪類，藏禁書。”總督“令中軍王英發兵圍廷祚宅，取其書以去。”這個案子後來拖延了七年多，劉著才被釋放。程廷祚有“紀方輿紀要始末”一篇，記此事頗詳。這就是儒林外史第三十五回寫的幾百兵半夜包圍莊徵君住宅，捉拿盧信侯的故事的真相。我

附記此人此事,只是要介紹儒林外史和顏李學派的人物的關係,並且要人知道程廷祚雖然不公然宣傳顏李學,他實在是常和顏李學者往來。

這個劉著大概是一個熱心的顏李學信徒。程廷祚集中有與劉學稼書,開端一段說:

前接手示,滾滾數千言,志趣甚高,議論甚大。所望於弟者甚殷以隆。吾黨畏友,素推足下。此非時人之所及知。卽此一書,寥寥海宇,知其故而能言之,幾何人哉?…

…(文集九)

這一段似有可以注意之處。劉著的“滾滾數千言”大概也是期望程廷祚担起振興顏李學的責任來。此書末有“來書言欲卜築湖南,決意入山”之語,大概是在劉著出獄之後,他自己要“入山”去了,所以希望程廷祚作一個負荷顏李學的領袖。程廷祚答書頗替宋儒辯護,我們可以推知劉著來書必有攻擊宋儒的話。答書又說:

弟自邇年以來,始深知學問之難,惟在躬行。千古以上,未敢輕議;後來茫茫,亦未敢輕議。

他這時候難道真已拋棄了南方顏李學的領袖的資格了嗎?還只是因爲劉著“稟氣粗豪,未能琢磨純粹”,以致到處闖禍,所以程廷祚有點戒心,不敢在這位“吾黨畏友”面前說真誠呢?

宣城袁蕙纒書可以爲證。還有別的證據。他的兄弟程嗣章做了一部明儒講學考，程廷祚作序文，說明明儒不外於朱陸兩派：夫道果出於堯舜以來之所世守，則一而已矣。今日“卽物以窮其理；”又曰“六經皆我注脚。”起聖人而折衷之，其是非離合何如也？紛紛之議固有所不能已矣。有明之學者不出二端。……崇禎之季有吾家雲莊先生起於新安。國朝康熙中，有習齋顏先生起於博野。習齋動必以禮，敦善行而不忘，率門弟子講求禮樂兵農之實學。孟子有言，彼所謂豪傑之士也！雲莊先生明睿挺出，以大易立教，獨闡性命之微，而謂之極數。學者鮮能得其途徑以入。……朱陸而後又有兩派，因附識於此。（文集六）

這裏前面略評朱陸兩派，深表不滿意，後面對於顏元特別稱贊，這可見程廷祚不完全諱匿他敬信顏學的態度。

他有一篇與家魚門（程晉芳）論學書，態度更明顯了：

愚閑居更訂說經舊稿，因念聖經莫不切於人道，而體有不同。故學易多蔽於象數，學詩每眩於比興，蓋所致然也。惟論語一書以問答之體，質言學問政事，而立爲教學之準則，……萬世以下，欲求實德實行者，于此乃有所持循而無隕越也。……後儒詮解，非學究之陳言，卽名士之清談，而得其要領者未之見焉。

愚近作禮樂論（文集三），適緣有感於此。李恕谷傳註諸書，足下閱之，以爲何如？其師弟亦非無所見者，正可與拙論相發明也。

要之，後世學者所爲，不失之高，則失之卑；之于歧趨則易，致于中道則難。其逸出於此者，則機變巧僞，無所不爲，以爲人害。蓋三代之所以不復見者在此數端，而皆根于禮樂之廢。足下能不助我盱衡而嗟嘆哉？

宋儒之學根本既與三代有異，而復好爲高論，與魏晉習尚似異而實同。然在魏晉，出於莊老本不自諱，而宋人之于佛氏則陷于不自知。此莊老之害道者淺，佛氏之害道者深，而受其病者亦如之。程明道以言性便不是性，羅仲素令人觀未發氣象；此兩先生豈真欲託足空門，乃漸染於其說而抱黎丘之惑也。（黎丘之鬼能效人子弟之形，有丈人爲鬼所惑，以鬼爲其子，而以其子爲鬼。見呂氏春秋。）俗儒但知掎擊陸王，而不知“陰釋”之所由來，亦何足以定其論而服其心乎？

今日者，其人已往，其書具存，明者自能辨之，何必深求？而其作爲訓詁，遺累聖經者，則不可以不論。

顏李師弟立言過於峻激，致生驚駭。而非其人亦孰與掎學術之敵耶？

足下欲辨學術，惟求其歸於論語，而無卽以宋人之論語爲論語，其可也。（續編七）

這是一篇最重要的傳教文字。程廷祚和程晉芳做了三十多年（1736—1767）的朋友，晉芳是姪孫輩，程廷祚看他聰明好學，所以很敬愛他。他對於外人不敢宣傳顏李學，現在對於這個有點才氣的姪孫却想做點傳教的工作。他把李璿傳注的諸經送給程晉芳看，並且明明白白的說李璿的思想正可以和他自己

的思想互相發明。他在這裡很不諱飾的承認顏李師弟“非無所見者”，並且很堅決的宣言：

非其人孰與掇學術之敝耶！

我們讀了這種宣言，不能不相信程廷祚始終是一個顏李學的大師。程晉芳始終不能接受顏李的思想。他的勉行堂文集有與家綿莊書四篇，其第三篇即是答此書的，書中承認顏李也有長處，但道統仍須歸程朱！他作程廷祚的墓誌，竟一個字不提及他和顏李學派的關係，這是他很對不住他的死友之處，與方苞有同樣的卑污。後來他作正學論七篇，其第二篇提起顏李，竟引方苞的李剛主墓誌為定論了！

李璡勸方苞奉顏學，程廷祚勸程晉芳信顏李之學，結果都恰得其反。但這只是方苞程晉芳的失敗，於李璡程廷祚毫無損失。

程廷祚的顏李學當然是一種變換過的顏李學，不是原始的形狀了。變換不一定是進步，也不一定是退化。變換只是時代和環境造成的結果。最明顯的變換是顏李學的宗教成分大減少了。顏李門下，人人各有日記，各有功過格，有過用黑圈記出，這都是晚明的宗教風氣。顏李都反對理學家的靜坐主敬，但他們都要“習恭”：他們自律的戒條是“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李璡晚年改為“小心翼翼，懼以終始”。我們在程廷祚的著作裡，在程晉芳做的墓誌裡，在儒林外史的描寫裡，都看不出程廷祚有這樣的舉動。大概他的見解已能跳出這一方面的顏李學，雖然“動止必蹈規矩”，已不受那種變相的袁了凡宗教的

束縛了。

其次，是他對於程朱的態度變的比顏李和緩多了。上文已說過，他自己承認他不願得“共誣程朱”的罪名。在這一點上，他和顏李的見解很不相同。顏元說的最明白：

予未南遊時，尙有將就程朱，附之聖門之意。自一南遊（顏元南遊，至河南爲止），見人人禪子，家家虛文，直與孔門敵對。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乃定以爲孔孟程朱判然兩途，不願作道統中鄉愿矣。

李塏讀書較多，學問較博，眼光較闊大，所以他能承認

先儒歧路亦非有心，時勢積漸莫能自主。（見他與方靈皋書。）

但他對於宋儒，對於程朱，還是很明白的批評攻擊。他晚年（六十九歲）還對方苞說：

顏先生學之切實，君所素許也。但謂宋儒是聖學，則天下無是非並立之理。請問其以主靜爲主敬之功是禪宗否？其存誠是愚誠否？其窮理是俗士之誦讀否？以六藝爲末務粗迹而專講性天，背聖學否？以致聰明人盡歸無用，遂使神州陸沉，王夷甫輩安謝其咎？仁人念之垂泣否？（恕谷年譜卷五）

顏李的態度這樣明顯，程廷祚當然明白。不幸他受了方苞的影響，又怕得罪“功令”，所以他對於那位本家祖宗（程子）和那位同鄉大賢（朱子），總不能不存一點寬恕的態度。他的態度是根據於他的歷史見解的：他承認兩宋的道學運動在歷史上應該佔一個重要的地位。他說，漢儒和宋儒各有他們的歷史地位：

六經出於秦火之餘，先漢諸儒抱殘守缺，又能求其名物度數，轉相訓釋，使欲明經者有所由入。其功不可誣也。然聖人之道以是存，不以是盡。宋儒有見於此，蓋自孔子之沒千數百年而衆喻於聖人之可學而至者，濂洛諸君子之力也。……

蓋漢代人主懸利祿以誘進天下之通經學古；而士之有志者亦惟以爲聖人之道盡於章句訓詁，未嘗反之身心而自驗其是非離合也。

宋世諸子自謂得不傳之緒於遺經，雖其所見未必一一合於聖人，而皆能用心於內。其所謂主敬存誠，致知力行者，大端與孔孟之旨相近。視漢儒之學苟以譁世取寵，相去遠矣。故其徒多謹身寡過之士，遭時多故，至於擯斥死亡而不喪其所守者，往往有之。語其末流，如揚雄劉歆之無恥者，曾見幾人乎？……（文集三，漢宋儒者異同論。）

這個見解，他又在別處詳細說過：（文集十，上督學雷公論宋儒書。）

凡史所謂“儒林”，大抵以待解說經義，著有成書者，而共人之邪正，學之純駁，率置弗問也。嗚呼，儒所由名，其盡於是而已耶？……

宋室之興，濂溪明道諸先生相繼並出；其所講求，超然異於前代。於是儒者之門戶始擴而大之，以上躋乎孔孟之堂。當此之時，史家雖欲不爲立“道學傳”，可乎？

他認清了宋朝的道學運動在歷史上是一個嶄新的，劃分時代的運動，值得另立“道學傳”，這是有歷史眼光的話。但他的特

別贊揚宋儒，就同顏李學的根本立場相衝突了。他說：

夫能察天理人欲之分，嚴義利公私之介，專務於存誠主敬，致知力行，孜孜然以聖人爲必可學而至者，此誠宋儒之不可及者也。若夫解經之是非離合，則宋儒之末節也。

這一段極力頌揚宋儒的話，我們試比較上文引的顏元李璉的兩段話，就可以知道程廷祚實在離顏李的思想很遠了。

他是不佩服宋儒的經學的；至少他覺得宋儒的經學是可以勝過的。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出，還是他的不敢詆毀程朱的心理作梗。他覺得：宋儒的尊嚴在於躬行道德的方面，這一方面是不可推翻的；但經學的方面本來不是宋儒的專長；推翻宋儒經學的某一部分，不算是詆毀宋儒，不算是違反功令。他說：
明道無解經之書，無損于明道也。伊川，朱子之所尊崇，乃朱子於伊川易傳，攻辯不遺餘力。以解易而誤，亦無損于伊川也。……

然則朱子設有解經之誤，後人援伊川易傳之例，豈所以獲罪於朱子哉？……

記有之：“事師有犯無隱。”今于無可非議之處而有訾謗，則過于犯矣。若已見其可議，而曲爲之覆，則近于隱矣。皆非事師之道也。

且孝經曰：“君有爭臣，父有爭子。”君臣主義，父子主恩，皆不能無爭。曾是學問之地而容阿附乎？朱子有知，當亦無取於此。

考朱子詩傳刻于最先，本義又未修改；後來議論多所

異同，晚年有“平生注經不免誤己誤人”之悔，此百世以下之所共聞。然則朱子紹聖學之真傳者，自有在矣。…
…執經義以商酌是非離合，此格物致知之急務，先賢殆所樂聞而不能無望於後人者。鄙見如是，曩曾以質之望溪先生，先生曰，然。（以上均見上督學雷公論宋儒書。）

這一大段議論，只是要爭得駁難宋儒經學的自由。宋儒的躬行道德，我們可以不加非議，甚至於可以認為“無可非議”。但我們必要爭取“執經義以商酌是非離合”的自由。這一點，表面上看來，似乎是一個大讓步。其實這是一種手段，是在那個時代不得不如此的一種策略。這個時代起來的“漢學運動”採取的正是這種策略。蘇州惠氏一門的口號是“六經尊服鄭，百行法程朱，”正是這一邊讓步一邊進攻的策略。歐洲近世學者向教會作戰，也採取同樣的戰略：他們把信仰(faith)的世界完全讓給教會，他們只要爭取那理智(reason)的世界裡的思想言論自由。他們甚至於把整個精神的世界讓給教會，只要求保留一個物質的世界給他們去研究。這個策略是最聰明的：等他們把物質的世界征服了之後，那個所謂精神的世界也要歸到他們掌握之中了。

十八世紀的漢學家的策略確有這種意義。他們情願“百行法程朱”，來換得“六經尊服鄭”的自由。其實他們何嘗完全尊崇服鄭？他們拾出“漢人去古未遠”的口號來壓倒程朱的權威：他們的目標只是要爭取“執經義以與宋儒商酌是非離合”的自由而已。這裏面的戰略的意義也是要让出信仰的世界來換得理智的自由。躬行道德屬於信仰世界，商榷經義屬

於理智範圍。其實國家的“功令”只規定了一切考試場中的“經義”必須用朱子的四書集註，朱子的詩集傳，易本義，蔡沈的書集傳等等。功令並不問你贊成不贊成宋儒的道學。程廷祚和當時的漢學家所爭的“執經義以商酌是非離合”，正是“功令”所不許呵！正因為說經的自由是“功令”所不許，所以當時的學者必須力爭。爲了要爭得說經的自由，他們很巧妙的放出一種烟幕彈來，說程朱所以“紹聖學之真傳”其實不在經學而在躬行道德。我們都一致承認程朱的“道學”是無可非議的了，難道政府還不許我們在經學上給程朱做個諍臣諍子嗎？

這一個根本策略的意義弄明白了，我們才能諒解程廷祚對宋儒，對程朱的態度的轉變。程廷祚對程朱的崇敬，有時候真可以令我們吃驚。例如他對劉著（一個顏李學的老同志）說：

元明以來，學者稍知有貞觀註疏者，即無不極詆宋儒。然以弟觀之，可以當得“人”字者，究竟宋儒爲多。何則，彼固嘗致力於存誠遏欲而以實德實行爲事者也。至若解經之得失，乃其末節。……弟於程朱經學多所異同，而卒不能昧其本心，議及於宋儒之所得者，良有由耳。……（文集九，與劉學稼書。）

我們初看這樣的贊語，豈能不疑心他背叛了顏李之學？但仔細一想，宋儒的躬行豈不都根據他們的經說？存誠遏欲，致知力行，無一不是宋儒的經說的結果。如果宋儒說經的結果真是一些“可以當得人字”的人格，我們還有什麼不滿意於宋儒之處呢？

所以我疑心程廷祚的恭維程朱多少總有點不很誠意，多少總帶幾分策略作用。他的真意在他給程晉芳論學書（全文引見上篇）裡可以看出來。他在那裡說：

宋儒之學根本既與三代有異，而復好爲高論，與魏晉習尚似異而實同。然在魏晉，出於莊老本不自諱，而宋人之于佛氏則陷於不自知。此莊老之害道者淺，佛氏之害道者深，而受其病者亦如之。程明道以言性便不是性，羅仲素令人觀未發氣象，此兩先生豈真欲託足空門？乃漸染於其說而抱黎丘之惑也。

這才是對一個朋友傾吐他心裡要說的話。這才是他的顏李學派的根本立場。我們讀了他晚年（此書之作當在論語說著作時期，故已在他的晚年）說的老實話，不能不承認他對宋儒的和緩態度是一種手段，一種戰略。

我們看程廷祚在經學上攻擊宋儒的激烈，更可以明白他還是一個反對宋儒的學者。我們必須明白：攻擊宋儒的經學正是擒賊先擒王的策略。宋史道學傳這樣贊嘆宋儒治經的功績：

凡詩書六藝之文，與夫孔孟之遺言，顛錯於秦火，支離於漢儒，幽沉於魏晉六朝者，至是皆煥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

自從元朝仁宗時代（1314）規定了用朱註四書來考試經義之後，明清兩朝都繼續用程朱一系的經說做取士的標準書。程廷祚認清了經學是宋儒道學的最堅壁壘，所以他和同時的漢學

家都向這裡進攻。所不同者，漢學家往往惑於“去古未遠”的喊聲，往往過於相信漢代經師的荒謬的見解。程廷祚經過了顏李學的大解放，他的治經的目標不是要復古，是要切於人生實用，是要建立一種新的人生與社會，所以他不肯迷信兩漢經生的見解，處處要自己尋出一個他認為滿意的說法。

例如周易之學，漢學家拋棄了宋朝的“道士易”，却乖乖的回到西漢的“方士易”，豈不是以暴易暴！程廷祚在易學上用力最久，他一面拋棄了邵雍周敦頤朱熹的象數之學，一面他也不承認兩漢的互卦，卦變，卦氣之說。他頗採用程頤的易傳，也頗採納王弼的說法，又受了明末一個程雲莊的易學的影響。他主張周易是一部論人事的書，“易”的本義只是“簡易”，易的精義只是“生生之謂易”一句話。老氏說“長生”，釋氏說“無生”，易道只說“生生”。（文集一，易論；續編一，易論。）他批評宋人的易學道：

宋代諸君子……於剛柔易簡之理全不能明，而顧取陳希夷之太極圖，邵康節之先天，及劉牧之河圖洛書，諸怪妄之說以自矜微妙。豈足以勝佛老哉！（文集十，寄家魚門書。）

他治詩，治儀禮，都有批評宋儒的態度。最厲害的是他對於朱子的論語註的攻擊。他對程晉芳說：

後儒詮解論語，非學究之陳言，即名士之清談，而得其要領者未之見焉！

試想這些“後儒詮解”之中最有權威的是那部全國尊信了六百年的朱子集註，就可以明白這一句評語的十分大胆了。

在這攻擊宋儒經學的方面，程廷祚不失爲一個繼承顏李遺風的自由思想者。在那個漢學時期，他是獨立的：他的立場是顏李的立場，不是漢學家的立場。他的見解是創造的，建設的，哲學的而非經學的。他是顏李的繼承人；他是戴震的先導者。

我們現在可以討論他的建設的哲學思想了。

我們可以先看他晚年修改四遍然後定稿的論語說。他在論語說自序裡說：

論語者，六經之統會，大道之權衡，所以正教學之是非，而制生人之物則於不可過者也。自堯舜至周孔，而守一道。在昔爲司徒之命，典樂之設，爲三物之所賓興，（三物是六德，六行，六藝，見周禮地官。）其在二十篇之中，以文行忠信爲四教，以詩書執禮爲雅言，以孝弟謹信汎愛親仁餘力學文爲弟子之職業；其道易知，其教易從，要在率天下以立人道而已矣。……（文集六）

這寥寥幾句話是顏李教旨的綱領，凡曾治顏李學的人都能一見就認得。“率天下以立人道”一句話是程廷祚自己提出的最扼要的綱領。

論語說（有金陵叢書本；顏氏學記卷九摘錄）是一部很平實的論語解，很平和的指駁朱註的錯誤，很平和的陳說他自己的見解。書中偶引李塨的話，都稱“恕谷先生”，可見他並不隱諱他對於顏李學的敬禮。全書的宗旨只是要剝去宋儒的心性玄談，把論語恢復成一部平平實實“立人道”的書。例如第一章“學而

時習之”，朱註有“明善而復其初”的玄談；程廷祚只說“古者學必有業，古所謂業，詩書禮樂而已。”又如“子使漆雕開仕”一章，宋儒註一個“斯”字，說是“指此理”，又說什麼“心術之微”；程氏只依古註說“斯”指仕進之道。又如“克己復禮”一章，宋儒解“己”爲“身之私欲”，程氏只說“視聽言動卽己也。”

論語說中有幾個見解是值得特別注意的。第一是說“性無義理氣質之分。”這是顏元的性論。程廷祚說：

人資血氣以成形，謂之氣質。氣有美惡而皆不能無偏，因偏以流於習，而去性始遠矣。古聖賢設教，惟於人之氣質加以矯偏救弊之功，不言復性而性已復。

此種性論，老老實實的承認氣質是性，是顏李學的嫡派。後來戴震論性也從這裡出發。第二是說“理”。程廷祚說：

天理二字始見於樂記，猶前聖之言天道也。若大傳之言理，皆主形見於事物者而言。故天下之理，性命之理，與窮理，與理與義，皆文理條理之謂，無指道之蘊奧以爲理者。宋人以理學自命，故取樂記天理人欲之說以爲本原。

說理爲脉理條理，是李塈之說（見於他的周易傳注，傳注問），程廷祚的話，上承顏李學，下開戴震的新理學。

程廷祚有禮樂論兩篇（文集三），和他的論語說最有關係。顏元的思想有一個根本的大貢獻，就是主張“動”的教育，反對靜坐的理學；他要人習動，要人“犯手去做。”顏李之門學習禮樂都是要人動手動腳去實做實習。程廷祚論禮樂就是從這

個觀點出發。他說：

今夫禮樂之爲物也，不生于人而生于天。孩提而知歌咏，少長而知舞蹈，非有教之者也。五官百骸，生而用無不具。故曲折以赴禮，則一身之用行焉。鼓瑟射御，則兩手之用行焉。

今也禮樂之教既亡，人之與生而俱生者，則力遏其萌而不使之遂矣。終日匡坐而誦讀，無升降上下之節，無屈伸俛仰之容，則一身廢矣。琴瑟之不知，射御之不習，則兩手廢矣。是天與人以形體而莫不壞於有生之後。性命之理不順，人道之紀不修，誰實爲之？教之所致然也。是故莫弊於今之教法。（禮樂論上）

他的禮樂論也只是要用禮樂來提倡一種動的教育，要人運動一身和兩手。他老實說，誦讀六經不能替代兩手一身的訓練。他要人取“士禮所載，酌而行之”，要人考究琴瑟笙磬等樂器而復用他們。我們在儒林外史的記載裡可以看見程廷祚和他的朋友們在南京實習禮樂的情形。

程廷祚的晚年已是漢學極盛的乾隆時代了。大胆批評的“反理學時期”已過去了，新起的學人都只準備從文字訓詁和名物考證的方面做他們的樸學工作，都打定主意不談義理，不作玄談，不作建設哲學系統的理想了。這個時代的新風氣正是章學誠譏笑的“襲績補苴”的考證學風氣。

在這個空氣裡，只有兩個人還想建設一種新的理學：一個是程廷祚，一個是戴震。後者似乎是很受了前者的影響，所以

程廷祚的建設方面的思想是值得我們的特別注意的。

程廷祚的思想散見于他的各種經解和他的文集中。但他有七篇論文，題目是：

原人， 原心， 原氣， 原性，

原道， 原教， 原鬼神，

自成一個系統，可以說是他的思想的最有條理的敘述。他在原人篇裏說：

人生於天地之中。……形者，天之所生也。性者，天之所賦也。而吾之身日與天地相依附。……古之言人道者，曰父天而母地，曰事天如事親。聖人所以垂世立教者，其言不過如是而止。而其實則有不盡然者。火附于薪，火滅而薪存，則火與薪猶二物也。子生于父，父衰而子壯，則子與父猶異體也。若夫人之生也，本于天地之一交；天地自一交以後，以糟粕者成其形，以精者立其性，而天地之所知所能，遂舉其全而畀之於人。且不但此也，天地之知能自是遂退謝于無爲，而世界任人之關之，民物任人之奠之，鬼神任人之所以酌酢之。

易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知始成物而前，則人在天地。知始成物而後，則天地在人。而謂僅如薪火之相附，父子之相屬也乎？

這是他的“立人道”的哲學的宇宙觀與人生觀。他嫌古來的立教者都把人的地位看低了，看的太輕了。他承認“天地一交”而生人，但天地的工作盡於這一交。從那一交生人之後，天地就退舍了，就讓位了，就把天地的知能全都付托給“人”了，就把

整個世界交給“人”去開闢奠定了。未有人之前，“人在天地”。有人之後，“天地在人。”這是程廷祚最大膽的創說；古來說“人”的地位，沒有比他說的更尊貴的。

在原心一篇裡，他說明人何以這樣尊貴：

欲盡人之所以爲人，當先知人之所以異於物。欲知人之所以異於物，當先觀天地之知能。天地之知能何在乎？謂其能覆能載也，謂其能布四時而行日月也，謂其能歷久而不滅也。吾以爲皆不在是。

夫天地之知能，莫大于能生人，而尤莫大于能生人之心。心者，知之所載也，氣之至清者也。……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夫物生於天地之交。……惟于一交之中而人物乘之以生；又惟一交之中，其純粹而清明者獨鍾於人而不鍾於物。……然則所謂中者，是天地至清之氣也，是天地之知能也。未交以前，天地無此知能。

既交以後，天地亦無此知能。其端惟在於人心而已矣。天能生人而與以人之心，此人之所以不如天地也。生于天地而能全有天地之知能，此天地之所以不如人也。

人惟有此心知，故學天而至於天，學地而至於地。以及天地所不知不能者，而皆知之，皆能之。豈天故縱之以至此歟？……

這也是他的大膽創見。世界有人以後，豈但“天地在人”而已，因爲人有心知，所以能學天學地，甚至於能知天地之所不知，能爲天地之所不能爲，所以可說天地“不如人”了。

這個最尊貴的人是他的“立人道”的哲學的人生觀。

程廷祚繼承顏李的氣質一元論，所以很明白的反對宋儒的理氣二元論。在原氣篇裏，他說：

自後儒之論興，而天下乃羣然貴理而賤氣。……夫氣安可賤乎？自天地而下，一氣而已。吾見夫天地之始也，見夫天地之化之日出而不窮也，見夫萬物之生死消長也，無非氣者。……

太極亦氣也。……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夫以形色爲性，則氣之外無性也。又曰“浩然之氣”，不曰理而曰氣，則氣之外無理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領道於陰陽則氣之外無道也。

這是最澈底的氣質一元論，最澈底的唯物論。他說，後起的儒生

徒見其後來條理之分明，文理之燦著，乃羣然貴理而賤氣，曰，此氣質之性也，此形氣之粗也。噫，執其末而忘其本也甚矣！

這是說理只是條理，文理，還是繼承李塈的主張。後來戴震完全從這裡出發。

關於性，他另有原性篇：

人乘天地之氣以生。天地雖有不善之氣，而生人之氣則無不善。性也者，其氣之至善者乎？

……二氣粗遇，陽必求陰，陰必求陽，天地之性也，卽夫婦之性也。相求相感之際，其性既真，其情自密，必有綢繆交構于無間而不可以僞爲者。夫綢繆交構於無間，此至善之氣也。人乘此至善之氣以生，而謂性有不善

者，豈情也哉？……

然則性之義云何？曰，人之所以生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言性者，天之所以生物，即物之所以有生。……

然性之能不在五常，不在萬事，而在于能知，知在於能愛。（適接，此處似衍一個知字。）愛非獨愛其親愛其兄之謂也。吾觀于能言之孺子，無知之野夫，其無所聞見則已耳，其目所乍見，耳所乍聞者，則必求明其故于心，而屬屬乎其若迫。此其心必有不忍遺乎物，不忍外乎物者。

則萬物一體之大原備于此矣。……

這種性論，也是純粹唯物的看法。後來戴震論性，說“分於陰陽五行以有人物，而人物各限於所分以成其性”，完全是和程廷祚相同的。

有了這個唯物的宇宙觀，有了這個最崇高人的地位的人生觀，我們可以看看程廷祚如何論“道”與“教”。原道篇說：

囿形以言心，則不知心。膠理以言性，則不知性。離天以言道，則不知道。……

道者何也？道者，天命之不容已於天下者也。天地一交而生生不已；至善之原由此開，而物感之端亦由此啓。其端則有三：飲食也，男女之欲也，樂生而惡死也。是三者名爲物感，而亦發於至善之性。惟其感物既深，則漸流漸遠，以及于陷溺，而天下之禍烈矣。

聖人曰：吾將奪而飲食，禁而男女，杜而樂生惡死之心，毋論斷斷有所不能，即能爲之，亦必暫效于前而終敗于後，是與於天下之禍者也。不如因其所感而利導之，以

益明夫至善之所在。而“道”之大用行焉。

至善者，天之命也。天無乎不愛，而有至善。人無乎不愛，而有至善之性。道也者，廣其愛而節其愛者也。

無以“節”之，則飲食也，紵兄之臂亦可也；男女也，摟東家之處子亦可也；樂生惡死也，凡可以得生者無弗爲也。

有以“廣”之，故一飲食也，必至于民飢則由己飢；一男女也，必至於內無怨，外無曠；一樂生惡死也，必至于無一夫不獲其所。……

故曰，天命之不容已於天下也。

他的道是“人道”。他的教也是“立人道”的教。原教篇說：

教者，聖人之事也，率天下之人以盡性至命，而位天地，育萬地者也。

這就是他的論語說自序說的“率天下以立人道”。

人爲天地而生，天地待人而立。彼釋老者亦人耳，而乃置天地民物于度外，以獨善其身，吾知聖人必大有不忍于此矣。……

生生之謂易。天地以生生爲心，聖人以生生爲學。今釋氏則曰無生，老氏則曰長生。然則開闢以前可以無此一交；開闢而後，可以止于一交，天何爲而無不交，無不變，而有此不已之命，生生之易哉？……彼二家者，極其能不過獨善其身而止，而以天地萬物爲物。謂之其學，可也，不可以爲教也。

程廷祚的思想骨幹，大致如此。這個骨幹，我們現在看來，

是很淺近的,很簡單的。但我們不要忘了兩點:第一,中國思想家很少把自己的思想寫成有條理的體系的;程廷祚的思想已是比較最有系統的了。第二,淺近與簡單都不是毛病;顏李一派的根本立場正是要打倒那五六百年的精微玄妙的清談,重新回到粗淺平實的實德實行,實學實習。顏元說的最好:

學之亡也,亡其粗也。願由粗以會其精。

程廷祚的思想,大致還是用顏李學的簡單立場,加上他自己的思考,組成一個淺近簡單的系統。他承認“氣一元”的宇宙觀,天地萬物只是一氣,氣外無理,氣外無性,氣外無道。天地之氣一交而生物生人,人所分得的氣質最清,知能最高,能知天地之所不知,能為天地之所不能為。他並不願再進一步去探討天地如何產生人的心知,他只說,天地一交而生人,有人以後,這世界就是人的世界了。人的使命是“立人道”。人道之端不過是飲食,男女之欲,樂生惡死之情。人之道只是要“因其所感而利導之,以益明夫至善之所在;”只是要“廣其愛而節其愛”。這個思想體系的粗淺簡單,正是它的最偉大之處。他敢於拋棄那無數精微玄妙的義理,他肯捨棄那無數“囊風橐霧”的玄談,那正是顏李學的偉大。

這裡面,氣一元論是出於顏李的舊說,毫無可疑。從那氣一元論引伸出來的,如說氣質形色是性,如說氣外無理,也都是顏李說過的。程廷祚自己的貢獻,至少有兩點。第一是他特別崇高了人的地位,特別看重人的心知的重要。人的心知能窺探天地的秘密,學天而至於天,學地而至於地,其知能可以駕於天地之上。這是顏李不會說,也許不敢說的。顏李的“小心

翼翼，昭事上帝”的宗教，還脫不了中古宗教的範圍。程廷祚的“天地在人”的宗教才是“立人道”的新教旨了。（他的原鬼神一篇，還不能脫離那個時代的人對鬼神的迷信。他說，“鬼神之正而靈者，精氣之屬也；其不正而靈者，游魂之類也。”但他的結論也不過是“上天下地，陰陽運行，萬彙雜糅，鬼神起滅，皆人心之所爲也”。）

第二，顏元李塉雖然都反對中古宗教的“無欲”說，也反對宋儒的“無欲”說，然而他們師弟都不免受了這種無欲的宗教的影響。他們都承認“形色天性也”的話，又都說他們只反對“私欲”。其實“無欲”與“無私欲”的界限很不容易劃清。例如顏元的日常儀功裡，“不爲子嗣比內”是應記過的。“不爲子嗣”而同妻子睡覺，是“私欲”。“爲子嗣比內”就不是“私欲”了嗎？李塉年譜裡記他二十二歲時，

聞賣桃，動嗜心。既而曰：“一桃之微，可以喪身。”止之。推此例說來，“一飲一食，可以喪身，”何不絕飲食呢？“男女之欲，也可以喪身”，何不絕男女之欲呢？程廷祚好像沒有這種狹陋的宗教戒約，這大概是因爲他的父親是一位能詩善畫的藝術家，他的早年的家庭環境就沒有這種村學究講道學的陋氣。因爲這個原故，程廷祚不但在行爲上拋棄了那種“袁了凡功過格”的宗教，並且在理論上也擴大了顏李對於人欲的見解。他老實承認“飲食，男女之欲，樂生惡死”都是“發於至善之性”的物感。這是很大的解放。試看他論男女之欲：

二氣相遇，陽必求陰，陰必求陽。……相求相感之際，其性既真，其情自密，必有綢繆交構於無間而不可以僞爲者。夫綢繆交構於無間，此至善之氣也。

試用這段議論來比較顏元“不爲子嗣比內”的戒律，我們就可明白程廷祚已把顏李學格外“人化”了。

後來戴震的思想即是繼續程廷祚已開始擴大解放的思想。戴震說：

人有天德之知，有耳目百體之欲，皆生而見乎才者也，天也，是故謂之性。……五色，五聲，五臭，五味，天地之正也。

喜怒哀樂，愛隱感念，慍懞怨憤，恐悸慮歎，飲食男女，鬱悠蹙咨，慘舒好惡之情，行成性則然，是故謂之道。（原善中，一）

又說：

仁義禮智非他，不過懷生畏死，飲食男女，與夫感於物而動者之皆不可脫然無之以歸於靜歸於一，而待人心知異於禽獸，能不惑乎所行，卽爲懿德耳。古賢聖所謂仁義禮智，不求於所謂欲之外，不離乎血氣心知。（孟子字義疏證中，二一）

這都是完全接受了程廷祚的性論與人生觀，不過戴震說的更大胆，更透切罷了。

本來程朱一派的基本路子只有兩條：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程頤語）

朱子說，這兩句話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缺一不可。其實這兩條路的來歷很不同：格物致知是程朱開闢的一條新路，而“主敬”却仍是中古宗教遺留下來的一條老路。說來說去，程朱終逃不出“主一”，“無欲”，“主靜”，“靜坐”的主敬方法。顏李的革命運動大聲疾呼的指出這種主敬的工夫是佛老的遺毒，這是不錯的。然而顏李推翻了“主敬”，而建立了“習恭”，他們始終沒

有逃出那個主敬的中古宗教態度。程廷祚雖然還沒有公然攻擊那個宗教方面，——有時候，他還頌揚宋儒的主敬存誠，——然而他的著作裏完全不看見那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的顏李宗教了。戴震再進一步，大胆的指出程朱（陸王更不用說了）之學實在還只是走了主敬的一條路，而忽略了那格物致知的理智主義的新路。他說程朱“詳於論敬，而略於論學”。戴震不會提及顏李，但他對於顏李如果有不滿意的地方，那必定也是嫌他們跳不出程朱主敬的圈子，整天做那變相的主敬的工夫，而忽略了學問上的努力。戴震自己走的路只是那純粹的致知進學的新路，只是那“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以擴充人之心知之明”，“至於辨察事情而準”，“自能權度事情，無幾微差失。”這才是純粹理智主義的大路。顏李之學，到程廷祚而經過一度解放，到戴震而得着第二度更澈底的解放。解放的太厲害了，洗刷的太乾淨了，我們初看戴震的思想，幾乎不認得他是從顏李學派出來的了！

一九三六，四，七夜。

附記：我在十多年前（1923—1925）寫“戴東原的哲學”時，曾推測顏學與戴學的媒介是程廷祚。（商務印書館本，頁22—24）那時我只知道程廷祚與戴震同是程晉芳的朋友，但沒有別種證據。現在讀青溪文集續編，見程廷祚有兩處提及戴震：一處是他在六書原起論（文集三）中說“轉注”，用“近日新安戴東原說”；一處是他在與家魚門論萬充宗儀周二禮說

書(文集十一)中,說“聞里中戴東園素留心經義,足下早與往復,望走札問之。”後一事當在程廷祚未見戴之前;前一事當在他們已相知之後。戴受程的影響是很可能的。

附註一 程廷祚的青溪文集十二卷,有道光丁酉(1837)程兆恒刻本,有民國四年(1915)蔣國榜金陵叢書排印本。續編八卷,有道光戊戌(1838)程兆恒刻本,但傳世甚少,金陵叢書亦未收入。北京大學出版組現借得孫人和先生所藏青溪文集及續編,共二十卷,影印流通,並搜集程廷祚的集外文,及碑傳文字,附在全集之後,不久即可出版。

附註二 本文寫成付印之後,我查得宣城袁蕙纒名穀芳,曾為袁枚的小倉山房文集作“後序”,見袁集的舊刻本;又有答隨園先生書,見袁枚的續同人集;袁枚有答他的信兩篇,一見文集,一見尺牘。

顏 李 學 派 的 程 廷 祚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7385B

